

# 資本主義、文化運作與性別認同： 《港都百工圖》的未竟之業

藍佩嘉

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

謝國雄繼《純勞動》、《茶鄉社會誌》之後，完成新作《港都百工圖》。本書持續謝式風格，展現了細緻的田野資料、精采的概念分析，並且致力於理論的深刻對話。在謝氏三部曲中，《純勞動》承繼馬克斯與布洛威的理論透鏡，探照台灣的生產勞動體制特色；《茶鄉社會誌》轉受涂爾幹的影響，企圖剖析漢人社會生活的基本文化分類範疇。《港都百工圖》則綜合兩者之大成，一方面延伸「商品拜物教」的批判，呈現港都勞動生活中勞資範疇的生成變化與多樣性；這樣的分析透過「去物化」的方式讓結構力量現身，使作者得以經由社會學的分析與論述來介入現實。另一方面，本書強調勞動者不只是工人，也是家庭、文化、信仰、政治、性別的主體；透過慣行以及「存在感」的分析，本書得以更整體地呈現台灣工人的樣貌，以及多層次的社會生活。

本篇短文不算是書評，只是從一個讀者的立場，對本書的未竟之業提出以下三點期待與建議：一、從在地普遍化，再論資本主義；二、區分不同層次的文化、體察其日常交織運作；三、港都女工的缺席，以及看見男工的性別。

我非常認同本書所強調的「在地普遍化」的研究目標。結論中，作者致力和「結構與行動的互構」這個抽象層次較高的理論命題進行對話。此論雖然精采，我仍以爲有些可惜，因爲錯失了本書可以更直接、具體地對話的另一個大哉問，也就是「資本主義如何運作？」這個兼具歷史特殊性與理論普遍性的問題。

本書雖名爲《百工圖》，但研究範圍難免限於特定的職業與產業

別，我期待作者進一步說明：為何選擇這些勞動場域？它們具有怎樣的理論或經驗的顯著性，來幫助我們考察台灣的資本主義？為履行「在地普遍化」、「西方個案化」的目標，首先，我們需定位此經驗個案的在地、歷史特殊性，也就是探問：這些產業或職業如何具現了（特定歷史時期的）台灣的資本主義與商品拜物教的特殊形式？台灣個案彰顯了那些關鍵性的結構力量的作用？其次，以上探究讓我們得以彰顯出以西方經驗軌跡為典型發展出來的（貌似普遍的）資本主義理論，有那些限制與不足之處？在這樣的對話基礎上，我們如何重構有關資本主義發展軌跡與運作樣態的理論？

比方說，台灣的資本主義經驗明顯呈現國家的「看得見的手」。書中分析的若干職業之所以勞雇範疇模糊，源於國家的介入：如鐵路貨運搬運業，受到日本殖民政府以及國民黨營企業組織的直接介入（掠奪或抽頭），又如計程車業，在國家的間接介入（管制）下，創造了中介組織（車行）的租金（靠行費）。在那些勞資範疇清晰的個案中，國家的介入仍然非常鮮明，不論是從民營到省營又被民營化的唐榮鐵工廠，或是在政商連結上坐擁特權的美麗島工廠。

另一個影響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關鍵結構力量，在於外資進入後將台灣勞動者整合進全球生產鏈的一環。很可惜這點未能成為本書分析的軸線之一。比方說，書中訪問的皮鞋業師傅，暢談過往自由、專業、養家者的地位，若能進一步考察外資進入後對於其生產過程與勞動分工的影響，包括工廠生產線的引進與年輕女工的替代聘僱，將可突顯資本主義的動態轉變與全球化的在地作用。同時，外資也強化了消費主義的擴張，以及對全球現代性的意象與慾望，這又如何被整合進入台灣勞動者的自我認同與社會關係？

再者，西方學者用來分析（西方）資本主義的概念，可能有隱而不見的文化框架或社會預設；我們透過台灣個案的對話，可以反思與修正這些概念。如夏傳位曾在一場新書發表會現場的發言中指出，「商品拜物教」的概念有著西方基督教的宗教脈絡（將人與商品的關係比擬為人與上帝的關係），是否與台灣的文化脈絡有所落差？更多

的在地反思與跨社會／文化對話可以幫助我們將「西方個案化」，從而進行「在地普遍化」。

本書探討的形塑台灣工人生命經驗的結構力量，除了資本主義，還有作為認知基模(schema)的「在地文化範疇」。本書發現，台灣工人的行動有著特殊形式，也就是順理、順法、順勢而抗爭，作者大膽論證是在地文化中的「平權人觀」，如「做」、「份」、「命」、「剋」等論述，使得台灣工人傾向接受勞動商品化的現實處境。<sup>1</sup>

然而，究竟文化是什麼，又如何運作？本書導論（頁 35-37）區分出三個不同層次的文化：一、在地的文化範疇（人觀），二、勞動的社會分類（勞資範疇），三、工作現場文化（工人文化）；我建議再加入第四，企業的組織文化與意識形態。書中在討論「文化如何被勞動者創意地運用來經驗資本主義」（頁 37）時，多依賴工人的自我敘事，並集中於第一、二個層次的文化意涵。但其實書中也有不少涉及第三、四個層次的文化，如美麗島工廠的「打到」遊戲與工人文化，以及第六章中對於王永慶的論述分析。

我認為，本書若能在資料分析中區分這些不同層次的文化的作用，並探究不同層次的文化如何相互連結與交織，更能具體呈現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運作。這樣的分析可以突顯文化不是靜態的資產或給定的基模，而是人們動態運用的工具箱或持續協商的文化腳本。依此來看，不同階級、性別的主體有不同的管道來近用文化工具，人們協商文化的方式也受到具體的社會情境與過程的中介，例如勞動現場的組織或工人的集體行動，以及資本案或管理者如何整合在地文化範疇進入職場的文化控制。換句話說，不同層次的「文化」如何在勞動與管理的現場交織作用？透過怎樣的機制與過程，「文化」可能強化了工人的志願性順服？又在怎樣的情境下，「文化」可能提供工人看穿結構關係的透鏡？

---

1 柯志明老師在新書發表會現場提出一個相關的質疑：這究竟是在地文化範疇的作用，使得工人難以看穿資本主義的剝削，還是由於台灣的資本主義化不夠徹底，工人對勞資關係的認知仍停留在前資本主義、半封建的形式？

最後，女工的缺席是《港都百工圖》中很可惜的一處遺漏。台灣的「經濟奇蹟」高度仰賴女工的勞動貢獻，以打造電子、紡織、成衣、鞋業、玩具等加工製品的外銷產業。尤其是擁有前鎮、楠梓兩個加工出口區的高雄，彰顯了國家的介入、全球生產鏈、勞動力的女性化等台灣與其他後進資本主義體制的共同特色。

話又說回來，一定要研究女工，才能看到性別嗎？我認為並非如此，即便本書只以男工為研究範圍，也能呈現工人認同與工人文化的性別化。例如，早期的皮鞋男師傅，如同西方的行會工人，為男性所壟斷，我們可以進一步考察：該職場的技術傳承與勞動過程如何排除女性？皮鞋男師傅的專業認同又如何與男性社會角色、陽剛特質交織在一起？雖然作者沒有從性別的透鏡來發問或詮釋，但書中其實提供了不少生動而精采的田野資料，呈現工人不只是在「做工人」，也在「做男人」。

舉例來說，皮鞋師傅會帶師仔（學徒）去花天酒地、勞動現場中不時出現黃色笑話，這些都是男性連結(male bonding)、排除女性的機制。師傅對「自由」的認知與實踐是高度性別化的：「有賺大家都到酒家去」（頁 71）。純勞動的高報酬，讓他們得以成功履行男性作為養家者(breadwinner)的社會角色，所以「免探聽就可以嫁」（頁 70）。師傅們也驕傲地使用男性生殖器的比喻來體現其手藝與專業：「買鞋的不懂睪丸」（頁 68）。

又如唐榮鐵工廠工人，他們在描述失業心情時，強調的是男性養家責任的失敗，自嘲需「捏著睪丸撐下去」（頁 234），同樣運用男性生殖器的比喻來象徵陽剛特質。有趣的對照是，藍領工人也用「飼養」職員的說法來貶低管理者（頁 214），言外之意是嘲諷這些白階男性不夠 man（被養，而非養人）。如同 Joan Scott 所說，性別作為一種比喻，象徵了權力關係。在這裡，男性工人希望透過「女性化」的修辭，來反抗男性之間的階級從屬與權力位階。簡言之，資本主義不只衍生了階級的從屬與對立，也同時生產了性別的差異與支配。